

一、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與文化體制改革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張執中副教授主稿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以提升文化軟實力為主軸，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之戰略目標。對外推廣大陸文化價值觀，增加國際影響力；對內築牢思想防線，應對社會多元價值挑戰。文化體制改革涉及中共對其執政合法性之思考，中共對其新時期意識形態之詮釋與界定，如何才不會否定整體，並能維繫政治體系穩定，仍待觀察。

中共於今(2011)年10月15-18日召開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七屆六中全會」)，全會以文化建設為主軸，通過「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中共高層近年來不斷為文化體制改革「吹風鼓勁」，其主因在於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在物質領域雖然有龐大的「貿易順差」，但是在精神領域卻感受到明顯的「文化赤字」。因此隨著大陸「硬實力」逐年提升，如何在文化領域建立對等的「軟實力」，在國際場域擴大「話語權」，成為本次全會的觀察重點。

(一)「十七屆六中全會」與文化建設目標

去(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體學習，胡錦濤對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表講話，概括為「三個加快、一個加強」(即加快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加強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被視為替下一阶段大陸文化建設方向定調。另從今年胡錦濤的「七一講話」，以及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亦提出文化對民族凝聚力與綜合國力的影響，因此如何建立與大陸國際地位相對稱的文化軟實力，成為「十七屆六中全會」的主軸。

全會的公報中，混雜了中共不同時期的提法，包括毛澤東時期的「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鄧小平時代的「二為方向」(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值得關注的仍在於前述中共對增加文化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企圖心。公報指出，文化已成為民族凝聚力與創造力、國際競爭力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因此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在執行上，區分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在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下，政府主導的文化事業主要在於提供公共文化服務，而文化產業則按市場規則發展(指「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包括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國有單位改革、健全市場體系與建立人才隊伍。比如去年 8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會同大陸文化部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說明，提出增加政府補貼、文藝院團轉企改制以及 2020 年新聞出版業增加值占 GDP 的 5% 之目標(新華網，2010.8.20)。而在改革過程中，中共各級黨委要擔負政治責任，除了要把文化建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其成效也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

(二) 鞏固文化意識形態陣地

包括在「六中全會」公報，中共近年不斷強調「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並以雄厚的「家底」填補社福，以舒緩社會不平之鳴。但除了「物質」上的防線，「精神」上的防線也是中共極力鞏固的對象(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改革開放對中共的挑戰之一在於社會多元價值的滲透。從京奧期間「普世價值」之爭到「茉莉花事件」，中共認為意識形態領域存在一些與主旋律爭奪陣地的雜音噪音。因此，從提出「六個為什麼」到劃清「四個重大界線」，領導核心在思想文化陣地主張「正本清源」，要求黨員遠離西方民主思潮，繼續築牢思想防線。

當文化體制改革一方面要遵循市場力量「走出去」，另一方面又要防範西方思潮「走進來」，自然也就難以跳脫黨國干預的問題。前述胡錦濤在文化體制改革的講話，也被媒體視為中共中央發起一次新的「道德運動」，「低俗化」已被視為文化體制改革對象(明報新聞網，2010.8.6.)。但相對的，中共中央在掃除低俗化之餘，網路與媒體自由也成為新一波箝

制對象，Google 即為一例。因此，當公報中提出「要堅持正確創作方向...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工作.....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不禁讓大陸網民擔心，執政者自訂的標準與網路監管，可能限制草根民意「藉網出海」，扼殺網路公民社會的發展與言論自由。

（三）文化體制改革與執政合法性

本次全會可視為大陸官方對外發出信號，在「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的背景下，希望「軟硬兼施」，在國際社會發揮更積極的影響力。而中共高層也認知，光靠貿易與外交，還不足強化大陸在全球的話語權，更重要的是推廣「中國」文化價值觀。另就規模而論，大陸在出版、影視、語言的領先地位，讓可中共藉文化產業展現其軟實力。只是相較於西方文化的多元性，中共在文化領域所表現出的防衛心態，也顯示出中共在「市場經濟」與「思想障地」間的兩難處境。

今年 10 月初在廣東佛山發生「小悅悅」悲劇（一名 2 歲女童王悅先後被兩輛汽車輾壓，18 名路人見死不救），引發海內外對大陸轉型過程中道德與價值真空的反思。而近來在大陸興起的「紅歌」現象，起因來自社會失衡與濫權貪腐的不滿，地方領導人也藉著「紅歌」鞏固社會的思想障地，以避免「茉莉花」或「阿拉伯之春」降臨。這也可以體現出胡錦濤在「七一講話」中提出「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面對西方思潮的挑戰，中共除了擔心「和平演變」，還包括內部對意識形態的自我懷疑。透過文化體制改革，確保媒體、出版、電影、網路與黨的目標維持一定程度的「均質性」(homogenization)，藉以激勵民族意識，喚起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

因此文化體制改革，包含了中共思考新時期的執政合法性問題。在「市場」與「障地」的拉扯中，核心在於中共如何削弱意識形態的部分層面，卻不會否定整體；保留哪些部分卻能維繫政治體系穩定。就如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近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 (FT 中文網, 2011.7.20)，認為當前大陸具備新毛派思想和新儒家思想的選項，作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這兩種思想能否共存，或提供政權合法性，仍待觀察，最終還

是要靠大陸人自己找出現代之路。

二、2011 年前三季度大陸經濟情勢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李志強副教授主稿

受內、外部因素影響，今年大陸第三季 GDP 放緩至 9.1%，創近兩年單季最低成長紀錄，另外貿、外資增速亦下降，總體經濟走勢持續向下。

大陸 7 月份消費價格指數達 6.5%，創 3 年來新高，大陸國務院推動抗通膨措施後，8、9 月通膨趨勢稍獲控制。

大陸第三季製造業等領先指標漸趨穩定，惟在大陸今年緊縮銀根的政策下，民間借貸風險是目前大陸經濟面臨的新挑戰。

在當前歐債危機進一步蔓延，美國經濟依舊低迷的情況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大陸的經濟發展份外受到了國際的關注。受累於總體政策緊縮，以及出口需求不振的影響，大陸前三季各項經濟指標的成長率大都比前兩季回落(見附表)，顯示第三季大陸經濟情勢持續疲軟，但通貨膨脹率依舊維持在較高水準。

(一) 經濟成長速度進一步放緩

據大陸國家統計局在 10 月中發布的資料顯示，前三季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320,692 億元(人民幣，下同)，成長(與去年同期相比，下同)9.4%；增速呈現逐季小幅下滑的趨勢，其中第一季成長率為 9.7%，第二季為 9.5%，第三季則進一步放緩至 9.1%，創下了兩年來最低的單季成長紀錄，也低於外界原先預期的 9.2% 至 9.3%，可見總體經濟持續向下的趨勢並未改變。

在影響 GDP 走勢的因素中，前三季最終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和淨出口對 GDP 的貢獻率分別為 47.9%、53.4%和-1.3%，而上半年的數據

分別為 47.5%、53.2%和-0.7%，因此淨出口進一步拖累了經濟成長，投資的拉動作用還是最大。前三季，固定資產投資為 212,274 億元，成長 24.9%，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達 44,225 億元，成長 32.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則為 130,811 億元，成長 17.0%。

在城鄉民眾收入方面，前三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6,301 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成長 7.8%。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 5,875 元，實際成長 13.6%，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今年以來大陸各地紛紛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增幅平均為 20%左右。

（二）外貿、外資增速仍然下降

大陸第三季經濟放緩，除了內部原因外，還有國際因素。由於國際需求減弱，歐洲等地進口大量減少，自 7 月份後出口開始下降，8、9 月份出口分別比 7 月衰退 1.1 和 2.1%，也說明了外部環境更形惡化。前三季外貿進出口總額為 26,774.4 億美元，成長 24.6%；其中出口 139,22.7 億美元，成長 22.7%；進口 12,851.7 億美元，成長 26.7%；貿易順差合計為 1,071.0 億美元，減少 10.6%。

利用外資方面，前三季新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2.04 萬家，成長 6.2%，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 866.8 億美元，成長 16.6%；其中亞洲仍然是大陸主要的外資來源地和成長動力，而歐美地區則呈現衰退。前三季，亞洲十國、美國及歐盟 27 國對大陸的實際投資金額分別為 653.23 億美元、18.77 億美元和 41.84 億美元，成長率分別是 23.66%、-9.88%和-1.8%。

（三）CPI再創新高

前三季，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 5.7%，其中 7 月份為 6.5%，再創下 3 年來的新高，在國務院推動各種抗通脹措施下，8 月份 CPI 略下降至 6.2%，9 月份持續回落至 6.1%。CPI 雖然連續兩個月下滑，不過幅度不大，只能說通貨膨脹的趨勢初步被控制下來，但稱之為物價反轉點，還言之尚早，尤其是 9 月份食品價格仍上漲 13.4%，

豬肉價格的漲幅更高達 43%，食品仍然是 CPI 上升的最主要項目。

（四）貸款規模持續縮減

延續上半年以來貨幣供給增速放緩的趨勢，至 9 月底，廣義貨幣(M₂)餘額為 78.7 兆元，成長 13.0%，分別較 8 月底和去年底下降 0.5 和 6.7 個百分點，繼續低於年初設定的 16% 預期目標；狹義貨幣(M₁)餘額為 26.7 兆元，只成長 8.9%，分別比 8 月底和去年底下降 2.3 和 12.3 個百分點；9 月份貨幣供給不但創下了近十年來最小增幅，人民幣新增貸款也僅有 4,700 億元，創 21 個月以來新低，顯示大陸貨幣政策至今依然未見寬鬆。

（五）第四季經濟走勢展望

大陸第三季 GDP 降幅略超過預期，究其原因，除了物價上漲降低內部市場需求以外，貨幣供給和信貸增速的變緩也是原因之一，顯示大陸經濟活躍程度明顯降低。由於第三季歐美地區經濟表現也不佳，外需的不景氣反映到出口訂單上通常要 4 到 6 個月，加上人民幣在第三季不斷升值，未來幾個月出口形勢也不容樂觀。按照這種趨勢，經濟成長還有進一步回檔的可能，不排除第四季 GDP 成長率會在 9% 以下，甚至明年第一季仍會繼續回落。

儘管成長趨緩是大陸經濟的現況，但部分領先指標已漸趨穩定；7 月份大陸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0.7%，比 6 月份回落 0.2 個百分點，為連續 4 個月下滑，也創下了近 29 個月以來的新低，但 8 月份及 9 月份 PMI 已小幅回升至 50.9% 和 51.2%，並持續站上臨界點 50% 以上，顯示大陸製造業總體上仍處於成長狀態。此外，1 至 9 月份新開工專案的計畫總投資也比 1 至 8 月份回升 0.3 個百分點，從這些領先指標來看，大陸經濟硬著陸的機率並不高。

在今年緊縮銀根的政策下，目前大陸經濟面臨的新挑戰是民間借貸風險是否會蔓延至全大陸，溫州民企老闆「跑路」事件不但引發出中小企業的信用問題，並連帶拖累到房地產市場，許多民營企業出現

了資金鏈斷裂的危機，紛紛以低價賣房以求套取現金，使得房地產市場開始出現反轉跡象，這勢必產生連鎖效應，未來房地產投資將會下降，但會否導致房地產泡沫破滅仍然有待觀察。

針對溫州借貸問題可能引發的風險，大陸國務院在 10 月 12 日推出了九大扶植中小企業的措施，目的在緩解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困境。雖然 GDP 增速逐季回落，通貨膨脹率也有所放緩，但依然連續 4 個月在 6% 以上，所以第四季還不至改採取更寬鬆的貨幣政策。因為一旦貨幣供給放鬆，物價漲幅將可能再度攀高，最多只能在部分措施上作相應的變通，例如進一步給中小企業更多的信貸支持。但如果不改變長期以來在金融政策上偏重國企的信貸雙軌制，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恐怕還是難以全面解決。

附表 2011 年前三季大陸主要經濟指標

項目	總量	較去年同期成長(%)	前兩季成長率(%)
國內生產總值(GDP)(人民幣億元)	320,692	9.4	9.6
其中：第一產業	30,340	3.8	3.2
第二產業	154,795	10.8	11.0
第三產業	135,557	9.0	9.2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5.7	5.4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		7.0	7.0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14.2	14.3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人民幣億元)	212,274	24.9	25.6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人民幣億元)	130,811	17.0	16.8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幣元)	16,301	7.8	7.6
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人民幣元)	5,875	13.6	13.7
進出口貿易總額(億美元)	26,774.4	24.6	25.8
其中：出口額(億美元)	13,922.7	22.7	24.0
進口額(億美元)	12,851.7	26.7	27.6
貿易順差(億美元)	1,071.0	-10.6	-18.2
廣義貨幣(M2)餘額(人民幣兆元)	78.7	13.0	15.9
狹義貨幣(M1)餘額(人民幣兆元)	26.7	8.9	13.1
人民幣貸款餘額(人民幣兆元)	52.9	15.9	16.9

新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萬家)	2.04	6.2	8.8
實際利用外資 (億美元)	866.8	16.6	18.4
外匯存底 (億美元)	32,017	20.9	30.3

資料來源：大陸國家統計局、大陸海關總署、中國人民銀行。

三、大陸地方政府債務之評析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翁嘉禧副教授主稿

大陸地方政府債務高達 10.7 兆人民幣，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 2.6 倍。

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到位，讓大陸地方政府舉債缺乏約束機制，並長期被忽視。債務風險有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不定時炸彈，在局部地區爆發。

要從根本上解決大陸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涉及財政、金融體制的大幅度調整，以及政府職能轉變和用人機制改革。

（一）前言

按大陸所頒布的「預算法」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同時，「擔保法」規定：國家機關不得為保證人，但經國務院批准使用外國政府或者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者除外。由此可見，大陸地方政府舉債和提供擔保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事實上，大陸地方政府仍以各種名義舉借了大量債務；惟隨著地方政府陸續進入債務償還高峰期，龐大的地方政府債務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二）大陸地方政府債務激增

根據大陸審計署今(2011)年 6 月份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 2010 年底，大陸地方政府債務高達 10.7 兆元人民幣(以下同)。2010 年，大陸財政收

入 8.3 兆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 4.1 兆元，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債務餘額達到同期大陸財政收入的 1.3 倍，更高達地方財政收入的 2.6 倍。

由於償債能力不足，大陸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透過舉借新債來償還舊債，還有部分地區出現了逾期債務。因此，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已經威脅到大陸社會經濟的健全發展。

（三）地方政府債務成因複雜

大陸地方政府債務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投資擴張與財力不足的矛盾。地方政府透過舉債融資，加快推動交通運輸、市政基礎建設和能源開發等領域。此外，在應對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汶川大地震中，所籌措的資金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部分地方政府投資範圍過廣與投資規模過大，也造成債務快速膨脹。一方面，由於職能定位不清晰，部分地方政府投資範圍不僅涵蓋公共設施和服務領域，而且包括部分營利性和競爭性領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盲目追求 GDP 增長，許多城市發展規劃一再擴展，投資規模也相應水漲船高。

從深層原因上看，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到位，讓大陸地方政府舉債缺乏約束機制，並長期被忽視。大致上可從這幾方面來觀察：第一，財政體制不完善。1994 年的分稅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可用財力，但地方政府的支出卻逐步擴大。雖然中央政府試圖透過轉移支付來增加地方可用財力，但是轉移支付中很大比例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相關配套資金，這反過來又讓地方政府更加捉襟見肘，只好大量舉債。例如：在應對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時，大陸中央提出了 4 兆元投資計畫，但中央政府實際只承擔其中的 1.18 兆元，其他將近 3 兆元要靠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來承擔。第二，債務管理不規範。由於大陸政府部門利益錯綜複雜，政府收支管理並沒有完全納入財政部門的監管範圍，很多部門設法繞過財政部門舉債。財政部門不僅無法統籌和規劃預算外資金，甚至對政府資產和負債狀況都無法全盤掌握。大陸地方政府還大量設立融資平臺公司，但因為缺乏規範的管理制

度，且盈利能力較弱，相當多的融資平臺公司極易出現債務風險，最終轉嫁到政府身上。第三，監管與責任追究機制沒有建立。為規避法律限制，大陸地方政府往往採用各種變通的手段籌措資金，上級政府部門和同級「人大」都無法實施有效監管，社會和公眾監管更是無從談起。大陸目前的官員選拔任免機制存在缺陷，往往激勵官員急功近利，在任期內大量融資搞建設，償債責任卻轉嫁給後續者來承擔。

（四）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大且影響深遠

雖然從整體上看，大陸經濟正處於高速增長階段，地方政府收入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地方政府還擁有較多的固定資產、土地、自然資源等，目前地方政府債務尚不存在類似希臘債務危機的疑慮，但如果相關問題不能獲得有效解決，債務風險仍有可能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不定時炸彈，在局部地區爆發。這可從幾個面向來觀察：首先，債務風險影響金融安全。政府融資的主要來源是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基於規避市場風險的考慮，金融機構較願意放貸給具有政府信用擔保的融資平臺公司。由於資金多是投向市政基礎設施等經濟效益甚微的領域，貸款在短期內難以償還，如果集中進入還款期，就可能發生違約，銀行的不良貸款會大幅增多，特別是地方的中小銀行將面臨較大風險。其次，債務風險制約公共政策。面對龐大的債務償還責任和利息支出，地方政府在收支兩方面都面臨較大的壓力。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醫療、教育和保障住房建設等公共領域無法提供足夠的財力支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財政其實已經跟繁榮的不動產與高房價綁在一起，土地出讓金既然是地方政府預算外資金的重要來源，中央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地方將受到抵制，政府亂罰款、亂收費的問題也可能重新抬頭。最後，債務風險損害政府形象。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甚至債務違約，可能會帶來不良示範和骨牌連鎖效應，嚴重損害政府形象。地方政府在經濟壓力之下，更有可能發生與民爭利的惡性衝突，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

（五）結語

從 2010 年開始，大陸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分類管理、區別對待的原則，妥善處理債務償還和融資問題，加強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之管理，提高防範財政金融風險意識。目前採取的措施只能暫時抑制債務規模膨脹，減少債務風險。建立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的長效機制，還需要從體制上進行全面調整：例如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深化省級政府以下的地方財政體制改革、建立規範的轉移支付制度；制度化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嚴格控制債務用途和規模；加強金融風險監管，設立風險預警與評價機制，提高債務透明度，明確債務償還和監管責任。總之，要從根本上解決大陸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涉及財政、金融體制的大幅度調整，也牽扯到政府職能轉變和用人機制的大改革，這些皆值得進一步觀察。

四、美債風波衝擊下大陸外匯儲備的管理和變革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魏艾副教授主稿

美國債務風波對世界金融市場和經濟復甦帶來難以預料的衝擊，作為美國國債最大債權國的大陸將受到嚴重的影響。

美國債務風波對大陸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於帳面直接損失、實體經濟風險，以及引發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衝擊。

為避免陷入「美元陷阱」，近來大陸官方致力於調整對外經貿發展策略，並針對外匯管理體制進行調整，同時積極推動大陸企業的對外投資，以期拓展經貿領域和確保資源的安全獲取。

在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仍舊蔓延、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的情勢下，美國債務危機對目前仍處於不確定的全球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復甦無疑是火上澆油。美國長期主權信用級別出現百年罕見的下調狀況，對當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敲響了警鐘。美國巨額赤字

未來還會繼續惡化，信用評級挽回的可能性仍遙遙無期。但是受到最大傷害者並非美國本身，而是一直靠外部需求帶動出口貿易，藉此累積本國財富的國家，都將面臨所持有的美國國債價格下挫、流動性惡化的風險。其中作為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的大陸受到最大的衝擊，因而積極調整其對外經貿發展策略，並進行外匯管制制度的變革，其後續影響值得密切加以關注。

（一）美國債務危機形成的背景

近年來，已開發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反映了國際債務模式的轉變。一般而言，國際債務危機的發生都是起源於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為推動經濟發展，需要大量資金，因此不斷對外舉債卻未能藉此帶動經濟增長，以致無力償還進而陷入債務危機。然而，進入 21 世紀，國際資本總量迅速膨脹，金融資本開始由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擴張，由投資實業獲取超額收益，轉向直接利用開發中國家的制度缺陷，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暴利。國際債務模式也呈現新的變化，原本的世界債權國卻成為債務國，債務危機的形式也由公司債務危機向主權債務危機轉變（徐琤，「美債危機的實質及其效應」，文匯報，2011.9.13）。美國此次債務危機正是國際債務模式變化的反映。

自 1970 年代初期美元與美金脫鈎後，美國經濟逐步走向高度虛擬化，而實體經濟逐步走向萎縮。據估計，金融衍生商品市場的價值從 2002 年的 106 兆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531 兆美元，相當於 2008 年全世界 GDP 60.587 兆美元的 9 倍，美國 GDP 14.202 兆美元的 37 倍。鉅額的金融衍生商品反映出國際資本追逐高報酬或安全性的流向。然而，累積的結果卻形成了已開發國家的債務危機。

一般估計，開發中國家購買已開發國家國債和其他債券總回報率約為 3%-4%，而已開發國家集中本國資本和流入資本再投資到開發中國家獲得回報率高達 10%-20%。開發中國家購買已開發國家債券回報率較低但較安全，已開發國家的企業不如債券更具有吸引力，而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對開發中國家的投資能獲得更高的回報率，這些跨

國公司不可能把投資轉回國內（李長久，「美債危機給美國帶來豐厚“效益”」，經濟參考報，2011.9.6）。

近來許多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引起投資者對世界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向全球金融體系蔓延的擔憂。美國從 2007 年次級房貸危機到目前的債務危機，先後兩次嚴重衝擊世界經濟，導致世界經濟衰退，而美國經濟也陷危機邊緣。表面上看來，美國主權債務危機是擴張性宏觀政策的結果，赤字已經成為已開發國家抵禦危機、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從而形成經濟危機、政府干預、財政赤字、主權債務危機的惡性循環。

截至今（2011）年 5 月中旬，美國聯邦政府已經突破 14.29 兆美元的法定舉債上限，美債危機浮出抬面。為解決迫在眉睫的美債危機問題，幾乎是在即將產生債務違約的最後時刻，美國政府與眾議院達成突破債務規模和減少赤字規模的初步框架。依據暫時性的框架方案，允許將債務上限提高至 2.4 兆美元，但同時保證在未來十年內削減赤字的數額略大於此一規模。框架方案將分兩個階段來操作，亦即：第一階段，債務上限立即提高 1 兆美元；第二階段，將創立一個特殊國會委員會投票表決今（2011）年下半年超過 1.8 兆美元減赤計劃的基本框架（「美債危機不改我經濟基本面」，人民日報，2011.8.22）。

（二）美債危機對大陸經濟的影響

美國作為世界貨幣的發行國，美元在國際金融領域擁有絕對的影響力。在國際貿易計價上，全世界外匯儲備以及國際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別占 48%、61.3% 和 83.6%。「美元本位」不僅支撐美國債務的國際循環，也能透過債務貨幣化或變相貶值增加國民財富，達成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利益轉移。一方面，作為貨幣發行的國家，美國可以透過增發貨幣以履行對外償付義務或稀釋對外債務負擔；另一方面，美國又可透過對外大量長期直接投資獲取巨大經濟利益。因此，一般認為，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可以透過債務循環獲得全球化財富分配的最大收益，債務不僅沒有對美國形成制約，反而成為美

國維持金融地位的工具(徐琤,「美債危機的實質及其效應」,文匯報,2011.9.13)。相對於美國,大陸、日本、英國則是前三大美國債權國。截至 2011 年 5 月底,大陸持有 11,598 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而日本和英國則分別為 9,124 億美元和 3,465 億美元。

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的下調讓全球資本市場蒙上層層的陰霾。大陸以美元為主要資產的龐大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已無可避免,但是這只是相對貨幣價值變動問題的一面而已,尚非最大的風?。由於大陸擁有高達 3.2 兆美元的外匯儲備。據估計,美元在大陸外匯儲備中的比例在三分之二左右,其中包括購買的近 1.1598 兆美元的國債,約占美元外匯儲備的一半。美債評級下降,將可能導致大陸投資美國國債的帳面減值將達 20% 至 30% (鍾景聞,「美國禍水外引、中國逆境築堤」,經濟導報,2011.8.15),大陸已陷於「美元陷阱」之中。

事實上,由於大陸長期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相應投放的貨幣就會越多,而過多投放貨幣,就容易引發通貨膨脹,進而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到今(2011)年 3 月底,央行外匯占款餘額已達 23.7 兆元(人民幣)。這也就是央行購買外幣累計投放的人民幣數額,儘管此一數值只占同期廣義貨幣(M2)餘額的 31.27%,但由於此一部份貨幣直接投放到企事業單位和居民個人手中,屬於基礎貨幣的投放,並且基本上表現為銀行的一般性存款,銀行可用以發放貸款,增加新的貨幣投放(王永利,「目前外匯儲備過多偏離了貨幣儲備物的本質要求」,經濟參考報,2011.7.13),透過貸款貨幣的乘數效應,這部份外匯占款的數量,也成為目前大陸通貨膨脹壓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於此一認知,目前大陸方面的貨幣政策再次面臨類似於 2008 年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困境。一方面,如果繼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則導致大批企業資金鏈斷裂、中小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另一方面,如果不再提高存款準備率,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將繼續被動地增加「外匯占款」所帶來的貨幣投放,則導致通貨膨脹壓力增大。此外,如果採取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替代存款準備率,隨著大陸利率大幅高於美國、日本等國的基礎利率,則導致熱錢進一步大舉進入大陸套利,

而大陸所面臨的基礎貨幣投放壓力和通貨膨脹壓力將更大（余雲輝，「當中國成為美元的“泄洪區”—當前貨幣政策的困境及其對策」，經濟參考報，2011.8.15）。

（三）大陸對外經貿發展策略的調整

由於大陸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債權人，美國債務風波對大陸的直接影響主要為：第一，帳面直接損失。美國主權降級將帶來國債價格下跌，大陸帳面價值將會發生損失，影響外匯儲備的價值。第二，實體經濟風險。美國債務風波將使其國內開支受到影響，經濟可能陷入衰退，影響大陸的出口。第三，金融危機衝擊。美國主權債務風波可能進一步引發全球金融體系再次震盪，大陸能否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尚未完全穩定增長之際，妥善加以應對，存有相當變數（孫時聯、王家強，「美國債務上限：變數不定的前世今生」，經濟參考報，2011.8.11）。

大陸外匯儲備資產購買美國國債比例過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屬於被動的選擇。大陸的資本市場不開放，對外匯的管制嚴格，民間持有外匯沒有合適的投資渠道，也沒有培育健全的外匯交易市場，中央銀行只好購買企業賺取的外匯，變成國家的外匯儲備。目前高達 3.2 兆美元的外匯儲備，如此大的儲備資產，需要妥善的運用。購買美國國債也是個相對安全的投資渠道，然而將三分之一以上的儲備資產用來購買美國國債，比重確實過高，以致造成「債權人」被「債務人」綁架的情況。

近年來，如何發展更加平衡的對外經貿關係，已是大陸對外經貿關係調整的基本政策方向。基本上此一發展策略的調整主要包括下列五大方向，亦即：1.由出口導向轉向進出口動態平衡的貿易關係。2.由吸引外資轉向雙向可控的投資關係。3.由倚重美元轉向多元自主的貨幣關係。4.由東部沿海開放先行轉向全方位的開放地緣關係。5.由利用外援轉向積極有為的發展合作關係（鄒加怡，「發展更加平衡的中國對外經貿關係」，國際經濟評論，2011 年第 4 期）。

但是在此一對外經貿關係發展策略調整的長期效應顯現之前，如何將長期以來大陸在世界經濟所扮演的儲蓄者的角色，實現向投資者

角色轉變，將是大陸方面所將面臨的重要經濟工作（丁志杰，「中國應從儲蓄者變投資者」，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9.20）。除此之外，在短期內，在外匯儲備的運用上，仍將繼續增持美元，主要原因在於：1.儘管近 20 餘年來美元匯率不斷貶值，但是全世界仍有四分之三的資本流入美國，雖然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淨流入迅速下降為三分之一，但是危機後的 2010 年又迅速反彈，顯現出美元資產仍是國際金融市場上較安全的選擇（「中國何以連續四個月增持美債」，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9.20）。

（四）大陸外匯儲備管理制度的調整和變革

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債務危機的持續發生，全球金融風險將較長期存在，以致大陸方面也積極採取應對之策，首先，積極與其他國家加強協調與政策合作，推動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和加強監管，要求已開發國家切實削減財政赤字和減少債務。第二，調整外匯儲備結構，突破「美元陷阱」，亦即調整債務、債權的貨幣結構，有效應對已開發國家債務危機帶來的衝擊，特別積極支持大陸企業「走出去」，把部份外匯儲備和美國債券轉為能源和其他礦產等資源儲備。第三，繼續加強國內金融體制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加強財政收支管理（李長久，「美債危機給美國帶來豐厚“效益”」，經濟參考報，2011.9.6）。

在改進外匯管理體制方面，如何疏通對外投資渠道，使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決策分散化，有助於提高大陸對外投資的整體效益，並且促成資本雙向流動，總量可控的資本帳戶管理機制，有利於資本流動的動態平衡，減少國際收支雙順差，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是今後大陸外匯儲備管理制度調整的重點。

今（2011）年 9 月 8 日，大陸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2011 國際投資論壇」上的演講時提出，「十二五」期間（2011-2015 年）的對外經貿發展方向主要有：

加大對大陸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支持和服務保障，將研究拓寬外匯儲備有效運用以及人民幣跨境流通的渠道和方式，支持企業對外投資。

將探索推動大陸有條件和有意願的經濟技術區，發揮他們的優勢，參與境外的經貿合作區的開發建設。

健全投資促進和保護機制，提高境外的風險防範和應急處理能力，有效地維護境外企業、機構和人員的合法權益，增強對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引導服務。

鼓勵走出去的大陸企業擴大對生產、深加工環節的投資，幫助投資的東道國發展能力、增加就業、改善民生。

此外，大陸商務部會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發布「對外投資國別產業指導（2011）年」，重點介紹 115 個國家的主要產業發展目標，優先發展產業領域，對外資行業進入規定等內容，顯現出大陸官方積極推動對外投資的決心。

五、大陸網路發展與民眾公共事務參與的政治性意涵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洪敬富副教授主稿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以掌握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及意識型態領域的主動權，強化和完善黨國體制在新媒體時代的執政與決策能力。

隨著網路通訊科技在政治與社會領域的不斷深化與應用，「網絡議政」對政治民主變革的催化與效用，將逐漸對大陸政府的角色與任務等產生影響。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七屆六中全會」）於 2011 年 10 月 15-18 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此次「六中全會」的全體委員會（中央委員 202 人，候補委員 163 人）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中共近年來首度針對「文化議題」作出的政策決議。此政策

決議要全面貫徹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立足發展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激發文化創作生產活力。其中再度高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政策的「雙百」方針，要求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在「決定」中，特別重申要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工作，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

（一）「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

大陸目前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都面臨著來自國內外不斷的衝擊與挑戰。大陸經濟崛起，2010年其人均GDP已達4,400美元，但東西發展不均、城鄉差距、貧富懸殊、環境生態、司法不公、住房、醫療、下崗失業、官吏貪腐等問題，時常造成官民關係、勞資關係不斷緊張，甚至各種「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究其問題的關鍵，不僅是在經濟崛起之後所要求政府在治理和危機（應變）處理能力的提升，更是大陸國家與社會間的傳播、對話、甚至是協商能力問題。轉型期大陸社會尤需要一種新的發展路徑和以「信任」作為重要根基的新社會價值。「十七屆六中全會」之「文化體制改革」中心議題相當程度上符合當前大陸社會發展之所需，適切的大陸文化體制改革作為或許將可進一步深化大陸社會發展的進程。

惟在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同時，全會也強調要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工作，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事實上，自由多元主義視大眾傳播媒體是促進和維護民主健康發展的重要機制，並在監督政府政策上體現其「看守者」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媒體時常被賦予對國家進行有效監督、制衡的「第四權」的地位。迥異於西方媒體監督政府的概念，大陸官營或黨營媒體主要扮演著壟斷重要新聞傳播或資訊來源的政治角色，並作為國家宣傳或政治教化、教育等工具。亦即國家宣傳體系下的傳媒主要是廣泛而深遠地傳播黨政高層領導或國家機關的意識型態、教條與政治信念，從而增強和鞏固其統治的正統性。

而所謂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正是大陸黨國大眾傳媒的輿論

武器特性，運用其享有之網路優勢來進行新聞輿論工作，俾利牢牢掌握虛擬世界的話語權，以及意識型態領域的主動權，強化和完善黨國體制在新媒體時代的執政與決策能力。換言之，這也是前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於 2001 年 7 月 11 日對網路治理工作所做的原則性宣示：「積極發展、加強控制、揚善隱惡、為我所用」(江澤民，「推動我國資訊網絡快速健康發展」，江澤民文選第三卷)。這十六字箴言便自此成為大陸進行網路治理與監管上的重要指導性綱領。

(二) 從佛山女童遭輾事件看大陸網民對公共事務的影響

2011 年 10 月 13 日晚間，在大陸廣州佛山市發生了一起車禍，一名小女童王悅接連被兩輛車子輾過，送至醫院接受治療後，於 10 月 21 日凌晨宣告不治。類似的社會新聞每天都在發生，但是這起在佛山發生的車禍卻引起了大陸全國性的關注，其原因在於案發後 7 分鐘內，共有 18 位路人從這倒在血泊之中的女童身邊經過，卻沒有任何一位願意伸出援手，將女童送醫或是呼救。

佛山市位於大陸廣東省中南部，經濟發展相當活躍，甚至於今 (2011) 年剛獲得大陸「全國文明城市」的三個提名資格之一 (「文明城市建設與社會管理創新高端論壇 4 日舉行」，廣佛都市網，2011.8.3)，然而，這起事件的發生無疑打了佛山市一個大耳光。自改革開放以來至今，大陸奉行的「GDP 主義」(唯經濟發展至上) 被指責為社會道德、信任關係淪喪的深層因素。大陸廣東佛山 18 人見死不救的事件也使得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呼籲社會深刻反思此「小悅悅事件」。

「小悅悅事件」其實在轉型期大陸社會中僅是其中冰山一角。這起事件在大陸網路上引發激烈的討論，除了譴責那 18 位見死不救的路人外，普遍一致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停止冷漠，譴責社會道德滑坡的現象，希望藉由對這起悲痛事件的重視，來喚醒大陸社會的人性與良知，這是推進大陸領導人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下之和諧社會的根本基礎——社會資本，一種以「信任」為基礎，有助於提升大陸社會合作及促成共同目標的社會關係特質的根本性轉變。

大陸威權政治發展上，公眾在網路上的言論往往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箝制，但網民、博主（指開設微博【Micro-blogging】者）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意願、態度、以及其所帶來如「網絡議政」、「網絡問政」對和諧社會關係、政治民主變革的催化與效用，將會越來越對大陸政府的角色與任務、官僚體制結構與市民社會發展、以及國家 - 社會關係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

（三）結語

大陸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公民意識及公民權的捍衛不斷地增強，且隨著網路通訊科技的創新，重組了舊有的傳播技術環境，使得人民的公眾/政治參與，出現如理性/非理性、暴力/非暴力等多元複雜的形式，進而可能挑戰大陸的傳統執政思維與能力。

資訊社會時代，網路與手機簡訊等通訊科技作為新型態的政治行銷、街頭社會運動、宣傳、抗議、與動員的事件層出不窮。當普通公民、政黨（團）或政府也逐漸使用（管制）這種新媒體來遂行活動與目的時，這種網路與行動通訊科技所帶來政治領域的影響或衝擊，也激發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與研究。網路通訊科技不僅在民主國家，甚至在威權國家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和影響。

網路通訊科技在政治與社會領域的不斷深化與應用，賦予了大陸公眾事務參與的重要角色，也對大陸官方慣以施行的政治與社會控制帶來了新的危機與挑戰。這種新的挑戰主要來自新興科技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威權國家的統治基礎，特別是資訊與新聞上的完全控制。然而大陸官方亦開始積極利用此新興媒體工具，主動提供在各種不同政經或社會等事件中的官方說法，而非僅是被動地回應民間社會的壓力，使之服務於黨和國家，並希望使網路與手機簡訊成為資訊時代下強化其社會控制與治理能力的有利工具。

總結而言，網路與行動通訊科技提供了大陸群眾參與公眾事務的重要介面及平臺，這種以崛起中的網民、微博博主、手機用戶、為重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現象，意味著大陸民間社會逐漸侵蝕、甚至漸漸取

得原先「完全」由政府設定議題的能力。普通公民亦得以在科技工具的藉助下，建構屬於民間社會的議程與聲音（話語權），這對於未來大陸公共領域、公民社會以及民主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

六、大陸「天宮一號」太空站計劃之評析

臺灣大學政治系陳世民副教授主稿

「天宮一號」的發射及其與「神舟八號」的成功對接，標誌大陸載人航太任務的關鍵性突破，奠定其世界第三大太空強國的地位。

「天宮一號」太空站計畫被視為大陸在國際間崛起的又一象徵，亦引發「太空勢力平衡」可能被打破的擔憂，以及大陸「太空威脅論」的說法。

2011年9月29日大陸成功發射首個太空實驗室「天宮一號」，繼而在11月1日發射「神舟八號」太空船，二者並於3日實施首次太空交會對接任務，此一成功對接標誌著大陸向建立自己的載人太空站又邁出關鍵一步，並反映出大陸綜合國力的增強，科技水準、工業水準的快速提升。其重要意涵茲分述如下：

（一）太空科技的重大突破

大陸媒體將「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的成功對接，形容為「一吻定江山」，它標誌了大陸成為繼美、俄以後，世界上第三個掌握交會對接技術的國家。大陸把實現載人航太的太空理想分三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是航太員上天，這已於2003年「神舟五號」完成首次載人任務實現，成為繼蘇聯、美國後，全球第三個送人上太空的國家。第二步是多人多天飛行、航太員出艙（2007年「神舟七號」完成首次），及實現飛船與空間艙的交會對接，並發射短期有人照料的太空實驗室；第三步就是建立

永久性空間站。「天宮一號」的發射，及之後和「神舟八號」飛船實施首次太空無人交會對接試驗，是大陸太空計畫第二步的後續任務，也被認為是大陸載人航太任務的一個關鍵性突破，其意義比太空邁步更大。

大陸將於 2012 年再發射「神舟九號」和「神舟十號」，其中至少會有 1 次載人交會對接試驗，已遴選出來受訓的太空人包括兩名女性，屆時大陸可能出現首位女太空人。如果試驗成功，大陸將掌握載人太空站的基本技術。天宮一號對接後將形成大陸首個無人太空站，為規劃中的天宮二號以及三號載人太空站進行準備。美、俄在 1960 年代即具備太空對接能力，大陸預定在 2020 年前建立自己的較大規模的、長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則將隨時都可以把人送上去，也將為航太工程育種的科技研究，提供豐富的空間資源和太空研究環境。

2020 年大陸預計將打造重達 60 噸的太空站，可載 3 名太空人，將由 3 個太空艙組成。一旦實現，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太空站，因為屆時，目前人類建造的唯一在軌太空站「國際太空站」將退役，大陸的太空站可能將成為當時唯一的在軌太空站。不過，美國 40 多年前就實現了載人登月，大陸現在僅僅實現了繞月飛行；國際太空站早在 1993 年就完成了設計並進入實施階段，但大陸的天宮一號才剛出發；國際太空站重達 400 多噸，而 2020 年的中國太空站才只有 60 噸。

（二）大陸崛起的另一重要象徵

無論如何，此二次成功發射，凸顯了大陸在太空科技競賽中，一個氣勢如虹追趕者的形象，尤其目前美國正大規模縮減了載人航太任務，2010 年取消了美國重返月球的計畫，使大陸成為唯一一個有實際計畫送人到月球的國家，2011 年 7 月，美國服役 30 年的太空梭正式退役。如果大陸在 2020 年實現載人登月計畫，並最終能夠讓人員從月球和地球之間往返，而美國的計畫卻被擱置的話，這仍會影響大家對美「中」實力之對比消長之印象。

在成為繼蘇聯、美國後，全球第三個送人上太空及掌握交會對接

技術的國家，這已坐實了大陸是世界第三大太空強國的地位，趕過了歐洲及日本。大陸通過太空計畫營造了空前的民族自豪感，這也被視為大陸在國際間崛起的又一象徵，標誌著大陸全球地位提升以及國家富強，甚至有人因而擔憂全球目前的太空力量平衡，是否即將被大陸打破。

（三）外交意涵

11月1日發射的神舟八號，德國也在其中安裝實驗設施，德國是第一個在航太科技領域與大陸進行合作的國家，這對「中」、德來說均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會拉近兩國的關係及為雙方在航太科技方面的合作翻開了新的一頁。其他國家參與到大陸的航太項目中，代表這個國家對大陸航太項目的信任和興趣，說明大陸在航太領域的科技水準已經被大多數國家承認。當國際太空站按照計畫退役時，大陸卻很可能在2020年建成自己的空間站，大陸的太空站將成為國際太空站的接班人。

這也象徵過去美國試圖阻止大陸進行太空探索的努力也已經失敗，這甚至促使大陸更加高效並更加積極地制定其太空計畫。大陸加入國際太空站受阻，主要是美國的阻撓。美國擔心北京的太空計畫具有軍事野心，加上彼此又是國際社會的競爭者，因此全力反對；大陸為此急起直追，並在2003年成為全球第三個實現載人太空飛行的國家。大陸是在要求加入「國際太空站」遭拒後，積極發展太空站計畫。雖然計畫中的大陸太空站僅60公噸，遠不及歐美等國營運、重達四百公噸的國際太空站，但能夠立足太空，仍代表不凡的成就。

（四）軍事意涵

大陸雄心勃勃的航太計劃一直受到多方猜疑，雖然對外一再重申了北京反對太空軍備競賽的立場。然而大陸在太空項目上投資巨大，與美國不同的是，要區分大陸的民用和軍用太空項目十分困難，因為兩者幾乎是一體。目前大陸軍事和經濟越來越依賴太空計畫的發展。

美國對大陸的太空項目也持續關注，在 2007 年，大陸曾使用一枚中程彈道導彈擊毀一枚本國廢棄的氣象衛星，使大陸成為僅有的三個測試過反衛星武器的國家之一，此事曾引發國際間的不少關注，美國擔心大陸已具備摧毀太空目標的能力。

「天宮一號」任務也引起了外界特別是一些美國學者對於所謂的「太空勢力平衡」將被打破的擔憂，它極富象徵意義，是大陸與其它國家共商全球航太問題的關鍵性舉動，這也代表了聲望，大陸正在趕上西方國家，正在探索超越美國資訊優勢的方式。在大陸不斷擴大太空行動之際，甚至也出現一股新的大陸「太空威脅論」。

（五）經濟意涵

「天宮一號」的建立可以為大陸帶來很大的經濟價值，「天宮一號」建成後，可以用來進行科學實驗、生產、太空觀測、偵察、在太空中儲備物質等多種用途。在對地觀測方面，當地球上發生地震、海嘯或火山噴發等事件時，太空站上的航太員可以及時調整遙感器的各種參數，以獲得最佳觀測效果。還有在太空育種方面，就可以培育出很多各種各樣的蔬菜，對農業會有很大的好處；在工業方面，還可以製造出在地球上製造不出來的材料。可以用來進行科學實驗、太空觀測等，比如 GPS 導航定位可以方便人們的出行。

七、大陸紀念辛亥百年活動觀察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張五岳所長主稿

大陸方面高規格舉辦辛亥百年紀念活動，試圖凸顯大陸建政之歷史意涵與正當性。

胡錦濤在辛亥百年紀念大會中，將國父「統一」願景與兩岸關係聯結，重申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

胡錦濤多次提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強調「三個堅定不移」為前提；高度肯定孫中山的歷史定位，並未提出「三民主義」為圭臬。

今（2011）年適逢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百年，大陸從北京到武漢、南京、廣州等地乃至香港、澳門乃與海外僑界，無不紛紛擴大舉行高調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動。在 10 月 9 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由「全國政協」籌辦的辛亥革命 100 周年紀念大會上，中共現任的 9 位政治局常委，與江澤民等卸任政治局常委（朱鎔基除外）也都出席了此次大會。胡錦濤更以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分發表一篇長達 3,600 多字的重要講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也高規格的發表社論與評論員文章，表達對於胡錦濤重要講話的學習。

綜觀此次大陸紀念辛亥百年活動，確實有下列諸多值得關注之處。首先，這是胡錦濤任內大陸最高規格的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動，凸顯其對過去歷史的意涵與當前政治考量。按照中共慣例，重要紀念節日逢「十」年大都會擴大舉辦，1961 年 10 月 9 日在辛亥革命 50 周年之際，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共有一萬多人參加。1981 年 10 月 9 日，北京一萬多人照例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集會，紀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表示，從鴉片戰爭起的近一個世紀，「我國有識之士包括孫中山都在尋求中國的出路」。2001 年 10 月 9 日，也有 6,000 人在人民大會堂參加的辛亥革命 90 周年紀念大會上，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指出，「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先驅們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彪炳千秋」，並稱「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始終把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視為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因此，今年適逢辛亥百年，也是胡錦濤任內所舉辦紀念辛亥革命最為重要的活動。胡錦濤高調舉辦自有其歷史的意涵與現實的考量。大陸南方都市報報導，「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年一次的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是全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像這樣 62 年一貫進行的高規格紀念活動，只有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中國共產黨生日可以與之相比擬。而大會在紀念辛亥革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之外，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胡錦濤藉由此次紀念活動，建立北京對於「中國」歷史正當性與詮釋權，並將百年前的國父革命願景與當前的兩岸關係發展相結合，自有其意義。

其次，胡錦濤在此次所發表的重要談話中，以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為名，有 23 次提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謂前所未見，也凸顯出其對於中華文化的歷史傳承正統的高度重視。此外，更將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振興中華宏願與對「統一」的提法，將當前兩岸關係與和平發展緊密相扣，並以追求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連結。胡錦濤強調：「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振興中華的宏願，應該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當今時代，兩岸中國人面臨著共同繁榮發展、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該成為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標」。胡錦濤並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強調「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雖然胡錦濤援引國父的「統一」說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根本利益」，但其也清楚理解到當前兩岸的政治現實，因此，針對當前兩岸關係也具體指出，「我們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增強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促進兩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提升兩岸經濟競爭力，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不斷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問題，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雖然提了 23 次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他也堅定的強調要「三個堅定不移」下實現，是以，胡錦濤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高舉和平、發展、

合作旗幟」。外界如果只看到胡錦濤提出 23 次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沒有注意到它是「三個堅定不移」的前提下推進，顯然有些一廂情願。

再則，在此次紀念大會上江澤民的出席與朱鎔基的缺席，引發外界的高度討論與聯想。此次在人民大會堂所召開的辛亥百年紀念大會上，北京現任領導班子都出席了此次大會，卸任的政治局常委，除了前任大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外，包含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前常委李鵬、李瑞環、宋平、尉健行、李嵐清、曾慶紅、羅幹也都出席了此次大會。其中尤其以江澤民的出席最受外界關注與聯想，因為江澤民出席的排名僅在胡錦濤之後，且自從今年 7 月傳出病危去世的消息後，外界對其健康狀況就高度關注。外界認為江澤民並沒有在今年 7 月擴大舉辦的中共建黨 90 周年活動露臉，也沒有在「十一」國慶露臉。是以，江澤民這次藉由此此次露面是要公開粉碎其病危的傳聞，證明自己健康良好，也希望能繼續在中共重大政策上發揮影響力。甚有論者認為，江澤民的現身，這將對中共「十八大」後的人事布局可能造成影響，因為這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等「太子黨」成員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利。事實上，回顧過去以往中共擴大舉辦紀念辛亥革命的慣例，除非江澤民真的健康不佳，否則出席自屬正常，因為其他常委也都出席。至於朱鎔基不出席當然與其強調裸退的性格，不喜參加公開活動有關，且以朱鎔基最近一再出版答記者問的實錄，直言不諱的風格，也讓外界對於他對胡溫體制經改現狀的不滿，不免有所聯想。是以，江澤民的出席與朱鎔基的缺席，其所呈現出的政治聯想，究竟對於明年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布局有何影響，仍待觀察。

綜觀此次大陸對於擴大紀念辛亥百年活動的觀察，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北京已經高度肯定辛亥革命肯定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定位，北京也意圖藉由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動，強化自身為「中國」歷史演進與中華文化發展的主導權與詮釋權。值得臺灣各界思考的是，北京在高調倡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卻是以「三個堅定不移」為前提，而非

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圭臬。北京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動高調肯定革命的歷史意義，但對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卻是略而不提。誠如，馬總統在今年雙十「國慶文告」開頭的第一句話，就說「今天是中華民國 100 歲生日，也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此外，馬總統在談話中呼籲北京當局，紀念辛亥雙十，大陸「不能割裂歷史，而必須呈現歷史原貌，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眾所皆知，兩岸關係要正常開展，不僅需要尊重過去歷史史實，更要正視目前政治現實，唯有尊重歷史與正視現實，方能建構兩岸和平發展的格局。